

◎文学聚焦

世界华文小说的家国情怀

戴瑶琴



家国情怀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母题,辐射怀乡恋土、血缘追索、生存焦虑、民族复兴等创作维度。从20世纪6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至今,创作者虽适应了“把自己连根拔起栽种到异国”的文化阵痛,但原本已无比坚定的“落地生根”,却发生了再次“落叶归根”的微妙转向,随之衍生的是文化乡愁由感性逐渐让渡于理性。家国情怀可以有三重解读,即对家国的定义、对家国的感情、对家国的期待。随着题材广度与技巧精度的双向提升,家国记忆、家国情感情、家国使命的传承和发展体现华文文学的新意与新变。

从“落地生根”到“二次移民”

20世纪60年代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困顿消极与渴望民族振兴的家国梦共生。海外游子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对亲人的依恋、对乡土的回忆、对故国的热爱中播撒开来。小说酝酿起失根的困惑,流转着“日暮乡关何处是”的伤感,对母国的眷恋,更深层次目的是获得文化的认同与精神的归属。同时,留学生文学特别关注留学生群体的切身问题,以此凸显中西文化间差别的明晰性和碰撞的必然性,但陈若曦借《突围》《二胡》等作品提议“告别畸形的、分裂的家国之恨,拥有健康的、平和的中国形象及中国情怀”。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是揭示留学生失根痛苦的经典文本。从避是在《野宴》中较早提出了“夹缝”概念,“生活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屋檐虽好,终究是别人的。”她同时回答了留学生该“怎么办”:“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书写我们的向往和梦……”

上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文学延续了於梨华、白先勇、丛甦、陈若曦等人对隔膜论的阐发,而此时的家国梦已与个体的自我实现交织在一起。比照同时期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同样有对文化失根的思考,它显现为父辈(中国经验)与子辈(西方经验)之间的文化理念冲撞,进而激化现实与理想的既定矛盾。谭恩美《喜福会》中龚琳达的一段独白可与其互证:“长期

以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我认为,留学生文学重点在失“魂”,而新移民文学则为失“根”。前者一直坚定于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和对西方文化的防御,家国之爱是格外浓烈而痛彻的;后者立足于个体的心灵体验,以文化夹缝中的两难心态为中心,传达新移民的即时状态:渴望融入西方但无法被完全认同,于是重回中国又不能再被全然接纳,最终还是选择回归西方。而90年代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张翎从中国故事起步,信奉写作这一行为本就是一种对故乡的回归,依据自己的青少年经历实施对江南记忆的重构,又将成年经验凝聚于北方叙事中再造。

21世纪以来的世界华文小说持续对家国的关注,但思考点已实现新的着陆:从海外处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转为现实问题/现实中国的思路结构。从某种意

义上看,视角的变化与创作者的频繁“海归”密切相关,他们得以直接融入中国现实生活,亲历中国新变,故而对家国的体验不再是来自记忆或经验,而是源自真实当下。薛忆沩在《希拉里·密和·我》中提供一个论点:“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那么,对于海归作家而言,故乡与异乡是辩证的,中国具备故乡与异乡的双重特性。他们是在场的旁观者,具有更自由的审视距离和更从容的观察视角,于是他们对家国的表达,可以从原先的情感攀援直击入现时的问题解决。《空巢》(薛忆沩),解析城市空巢老人为何成为电信诈骗主要受害群体的原因;

《垂老别》(张惠雯),揭露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人伦的崩坏,揭示失去土地的农村老人因其无用性与无利性反遭子辈遗弃的悲剧;《佐敦》(周洁茹),刻画内地女性移民在香港面对的生活窘境、身份歧视、家庭畸形。“香港的天,就比乡下的蓝吗?阿珍看不出来。”现居香港的阿珍、阿芳却与60-80年代欧美世界“边缘人”处境不期而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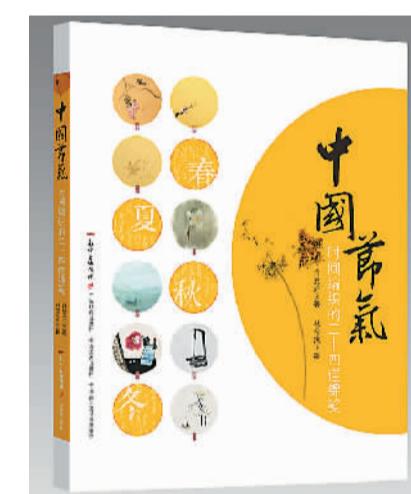
从家族溯源到家庭记忆

家族谱系构建是“家”的重要呈现方式。家族的代际传承是最基本叙事线索,与门风、乡土、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综合体,目的是反观社会问题与人性问题。考察华文文学的家族小说,如《交错的彼岸》《喷呐烟尘》《海神家族》《金山》《北鸢》,家族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的平台,深耕于文本的家国情怀,以家族血缘为点,以种族血脉为面。

张翎采用地标式的家族建构,即聚合家族流变史、个人成长史、文化发展史,将温州梦与他国梦谱系化和具象化,例如在《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里,形成西方望族与江南世家的中西呼应。而《金山》是她的家族叙事的阶段完结篇,最显著的文学价值是用现代汉语为“长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独灵魂,完成一趟回乡的旅途”。小说以洛基山与开平碉楼共同装载方氏家族的家国梦,方锦山、方锦河、方锦绣,托起“山河锦绣”的家族祈愿,包裹海外华人怀乡的浓郁和还乡的企盼。沈宁的《百世门风》探讨的论题是,在现代社会中该如何保留和传承中华文明的血脉。它侧重家族文化内涵的开发,以沈钧儒和陶希圣的家族谱牒为本,细数沈、陶两大家族传承的三大精神遗产:感恩、书生的傲骨和独立、明确的是非观念。2016年葛亮的《北鸢》,也是延续类似的节奏,设计卢文笙与冯仁桢两条家族叙事线,以家族血脉昭示民国风骨。

近年来,世界华文小说对“家”的塑造主动规避集体经验的叠加,格外专注个体家庭的事件与心理,以中国故事为叙事背景,收缩宏大的家族叙事,转而书写变动不居的普通家庭沉浮。《陆犯焉识》是严歌苓以祖父严恩春故事为小说蓝本,检视陆焉识、冯婉瑜与命运较量几十年中历历在目的跌宕唏嘘。张翎在《流年物语》里将全家放置于不同年代,由不同的机遇与处境撞击出刘年对自由的各种形式探索。李凤群的《大风》详述张家每一代人的寻根行动,重新定位个人与乡土的关系:“倦鸟总会归巢,而我们却将一去不返。”戴小华以《忽如归》为家人立传,诚恳记录戴家故事,视沧州“镇海吼”为精神旨归,阐明“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秉持并坚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价值观。

当前世界华文文学对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越加重视,家国情怀追随着“落叶归根”/“落地生根”中空间与身份的动态转徙,产生理念与理解的变化推演。家国情怀的持续性与新质性,彰显了海外华人文学创作者不停歇的文学想象力与不中断的社会主义使命感。



四节气自身的丰富。”

秋已至,给自己一段宁静的时光,翻开书,读读画,寻找时间遗落的痕迹,与山川风月、树木花鸟重新相遇和对话。然后,记录下光阴里自己的每一次感动,让我们平凡朴素的日子,有着风中摇曳的莲花般独具的中国滋味和诗。

带着这本清新的节气书,去过色彩斑斓的自然时间生活吧!

相似的地方。《告别马焦拉》同样描写的是—群在马焦拉岛上世代居住的村民因为修建水电站而被迫离开故乡、追问未来的心理历程。对于移民来说,白鹤镇不仅仅是一块物质意义上的土地,更是他们的精神驻地。白鹤镇上的花花草草都是祖祖辈辈的白鹤镇人亲手培植的,凝结着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过往的生活以及先辈的怀念。而白鹤镇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自身通过世代的劳动积淀下来的。老人们只有在曾经的乡音之中才能感到自身的存在,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上,潘灵的小说为我们展现了乡村变迁中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中国社会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

“白鹤豆腐”“阴阳井水”“斑铜唢呐”“跳花灯”,这些具有独特滋味和土气息的物、事、情,构成了库区移民的“白鹤乡愁”,成为整个故事的情感结与时刻在小说里运行的情绪意念;而潘灵在小说中不时引用的“山猪都吃不来细米糠哩”等乡民谚语洗练、明亮、饱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情感逻辑,成为小说人物所在有冲突、矛盾与行为、动作的叙述动力源与情感根源。

《偷声音的老人们》是新世纪乡土中国文学中的优秀移民文学,是对被遗弃的乡土文明的杜鹃啼血般深情召唤,传递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中国乡愁。

◎作家谈

文学是一个动词 ——兼谈地域文化对写作的影响

枫 雨 (美国)

任何上升到文学的东西传达的都是一种文化。作者的生活环境是他们写作的根基,也是支撑他们作品的内核。一个好的作者应该可以把抚养他的地域文化很好地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把文化本质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

我们看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虽然你可能没去过俄罗斯的顿河,但仍可以看到阿克西尼娅的围巾和格利高里的长皮靴,可以聆听到顿河的澎湃和生生不息,感受哥萨克民族的粗犷雄厚,原始野蛮中的炽烈情感和倔强,这是俄罗斯文化;老舍的作品,从对话到人物活动或环境,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浓重的北京“味”。比如《茶馆》,你不仅可以闻到茶叶的清香,看到八仙桌上的茶碗,而且可以体会到王掌柜的宽厚温顺,善良中的懦弱和自私,这是北京文化;鲁迅的作品,无论是阿Q的瓜皮帽,孔乙己的茴香豆和闰土的银项圈,还是抢走祥林嫂的乌篷船,都能体会到“绍兴师爷”的精密头脑和自以为是,小人物们对命运的抗争和愚昧顽固,这些都溢出江浙文化。

这种文化个性不一定是作者现在居住的地方。一个好作家出生地和曾经生活的地方也可能成为他的符号。在法国作家加缪的笔下,无论无处不体现法国的海滩和阿尔及利亚的阳光以及两个地区的人物故事。英国作家毛姆,用细腻的笔触呈现的东南亚异国风情,以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和交融,都让世界各地读者动容。地域文化深深影响了这些作者的世界观,他们的作品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文学学。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文学有捷径吗?有,就是从自己的经历开始。经历就是环境,身边的风土人情,一饭一汤,一草一木。这些都是地域文化。西方一首歌唱到:“雨落在皮肤上感觉,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知道。”身边的一切会潜移默化作者的思维和认知,中国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在一起,即使不说话,你一眼就能看出特点和区别,听到他们对同一件事物的理解和判断的差异,这就是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

创作的个性源于文化的个性。莫言写的大都是高密的土壤,赛珍珠的作品是写中国安徽的土壤。可见生活环境对人影响之深,尤其是少年时期。秘鲁作家略萨曾说:“人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应穿过语言,穿过信仰,到达别样的世界,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写作者通过承传本土文化,展现人文地理,历史民俗,穿着、方言、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气质和韵味。

我们这群生活在美的华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因为我们曾割断了自己的脐带,或者说像一棵树连根拔起又移植到了一片新的土壤。雨水是否充沛?土地是否肥沃?气候是否合适都要靠自己慢慢去适应去调整。我们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新思想新文化,试图摆脱很多旧束缚,体会个体的自由意志;同时,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以前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完全除掉,那种民族的烙印已经深刻在灵魂深处。

而在新大陆上,我们真正感受了东西方文化理念的撞击,会不自觉地去比较,有时甚至是被迫去改变自己的三观。可以说每一个作者都会经历很强烈的心灵冲撞和重组,这种冲击有时候是很痛苦的。而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个边缘人的角度去看待两种文化,从而比较清醒地分析,理智地接受。因此在作品中体现的思维就会相对新颖,反映的人文会比较客观。我们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到民族的印痕,这是我们的标志;但同时美国的水土滋养让我们在精神家园中视野扩大。华裔作家哈金说:“语言不是关键,眼界才是。”而华裔作者正是有这种优势:我们交融了两种土壤和文化,一方面我们有悠久历史的华夏积淀,一方面我们有自由的空气和勇敢的开拓,这让我们有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空间。这种双重地域文化的熏陶,让我们的世界不再是一条线或一个平面,而成为多维的。就像你戴着一个VR眼镜,看到的不只是前方的景色,也可以看到左右和脑后的360度景观,这种多维的文化滋补,让我们逐渐形成一种随意、安定、自由、敢于挑战权威的写作风格和态度。

美国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曾说:“20世纪很多作家留下的作品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越过疆界’。”纳博科夫、詹姆斯·乔伊斯、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等,他们都生活在多种语言和多种文化环境下,由于这种继承和张力,他们的作品更有活力,给国际化的读者也带来更多的精品文学。

文学是一个动词。它需要行动,从身边环境开始,不断比较、吞吐、融入、糅合、调整……到达一定程度,才会出真正有思想的活儿。我们说一部作品有创造性,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立足在地域文化的家园里。所有的想像力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从已有的资源里开发出来。没有地域文化的底色,语言就失去魅力,内容就会空洞没有灵魂。

世界上从来不缺天才作家,但更需要真正在一次次阵痛中思考重生的作者。在互联网新时代下,世界各国联系得更紧密,思想更容易沟通,文化更方便交流,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和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更多“越过疆界”的优秀作品出现。作为新时代的作者,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世界公民,依赖本土地域文化的滋养,并拥有俯瞰全球的视野,把“世界文学”起来,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新作评介

人类学意义上的当代中国乡愁 ——论潘灵小说新作《偷声音的老人们》

张丽军

云南作家潘灵的乡土小说有着深度叙事的丰富意蕴。新作《偷声音的老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昭阳坪社区移民的生活,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来。小说的线索大致有两条,一是以韩家川受命创作报告文学、来到昭阳坪担任社区主任助理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为串联,勾勒出昭阳坪移民生活中的一系列新情况。先是村里的5个年长的老头组成的“自救小组”偷录公鸡叫声失手打死了鸡,引起纠纷,之后是为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而精心准备的一系列活动。在此过程中,外来者韩家川参与了整个昭阳坪人的活动,目睹了白鹤镇人身上依旧保留着的被社区主任夏晓峰视为迷信的“民间文化”,并被他们身上将要遗失的风俗文化所打动。在他的努力之下,那些原本已经荒废了的民乐、民声在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迎接仪式上再一次焕发出光彩,但这次集中亮相也成民间文化的精神挽歌。

潘灵对生活熟悉而敏锐,在乡村内部发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艰难的蜕变历史,以及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隐现的农民的痛点。乡土中贴近自然的声音在这里便成为了一种深刻的精神隐喻。土地作为孕育了农民生命的有机体俨然已经成为农民赖以生存的母体,而移民工程从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个母体,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乡民都变成了无根之人。这些“偷声音的老人们”永远是一个无法进入的外来者。而身为“移民”的老人们,也因为链接生命的“游民”,无根可循。乡音消遁的新社区,是移民掉魂落魄的失声、失聪、生命式微之地。

何处安放我们这些远离乡土的游子心灵?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移民的心灵之问,也是急剧变化的全球化时代里的人类学意义的生命之问。

阅读《偷声音的老人们》会让人联想到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这两部小说在写作背景上有着十分